

书评

书海探奥，可作金针度人

——读彭程的《纸页上的足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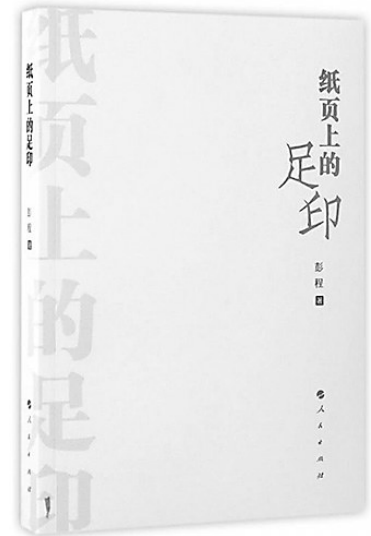
文/古耕

在读书界，“开卷有益”的说法由来已久。从倡导和鼓励阅读的角度，这自有积极意义，但倘若将此视为读书的普遍规律，则无疑失之简单粗疏。因为大量阅读实践告诉我们，在“开卷”与“有益”之间，还存在一个决定性因素，即开卷者自身的素养——开卷者只有首先确立科学先进的读书理念，即解决好为什么读书、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的问题，“开卷有益”方可落到实处，阅读也才能真正成为滋养人类精神世界的有效途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说：科学先进的读书观堪称阅读生活的灵魂，拥有如此灵魂的开卷者，才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。

彭程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名实相符的读书人。多年来，作为读书报刊的主持人和文艺评论家，彭程始终立足阅读前沿，在畅游书海，坐拥书城的同时，写下一系列与阅读相关的文字。这些文字或针对国内新版图书展开鞭辟入里的品评，或围绕西方经典作家进行别开生面的解读；或分析常见的阅读症候，或阐发重要的书界话题，自是一派寻幽探奥，取精用弘。其中最可谓笔力超逸，也最让人收获良多的，便是作家贯穿和浸透于字里行间的有关读书目的、取向和方法的深入思考与积极实践，即一种植根于丰富阅读经验的读书之道。这种并非多见的精神质地，不仅成就了彭程阅读世界的丰遂与隽永，同时也使承载这一世界向读者走来的作家新著《纸页上的足印》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，以下简称《足印》），愈发具有内容的独特性与厚重感。

人生需要读书，这大抵算得上一种共识。但要再问一句，人生为何需要读书？答案就会出现差异。在这方面，中国文化传统一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源自宋真宗赵恒，迄今仍被不少人信奉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……”这当中承载了太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，不说也罢。另一种说法便是孔子提出的“古之学者为己”之论。他所说的“为己”，指的是充实自己、提升自己、完善自己，强调的是读书与“修身”的结合，几近后人称赏的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彭程对读书目的认知，显然远绍孔子。在他看来：“人生苦短，大道多歧，但借助读书，我们可以减少、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耗和曲折，更为直接地抵达或贴近那些真谛”。为此，一部《足印》以从容细致的笔触，解析“阅读让人保持生长”的可能，诠释“读书让人目光笃定”的道理，揭示“读书与做好人”的密切联系，呼唤“书卷多情似故人”的生命境界。于是，读书成为人实现自我升华的重要措施乃至根本路径。

然而，作为拥有国家、民族和人类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，彭程又异常明白：读书可以升华自己，但又不是升华自己，而是通过升华自己来为升华更多人创造条件，或者说是以自我升华来促进社会进步。从这样的观念出发，一部《足印》所展示的阅读天地，便不仅属于“小我”，而且属于“大我”。即在审视个体阅读的基础上，将宏阔高蹈的目光，投向人类共同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与精神问题。譬如：《昆曲复兴与文化守望》透过昆曲的兴衰沉浮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换与创新发展的；《“探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诗人的领域”》围绕西哲“哲学走向荒原”的命题，阐发现代人面对大自然所应有的诗意精神；《选择善良》重申商业环境中道德的力量；《生命美丽》昭示现代社会仍须珍惜的生命关爱……显然，这样一些文字，不仅深切切入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，而且最终于精神血脉上接通了鲁迅“立人”的主张，直至马克思有关“人的发展”的思路。这



时，读书成为人世间的大善和至美。

在厘清读书目的基础上，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，便是如何选择并把握读书的取向？对此，彭程自有明确的观点和态度。他一向认为，现代人健康的精神生活应当是清洁的、高雅的、有深度的，而不是在感官的狂欢中“娱乐至死”。如此文化观念投射到阅读领域，便很自然地形成相应的价值坐标，这就是：远离时尚，警惕炒作，同时亲近经典，取法乎上。在前一意义上，作家提醒人们，不可被“流行”“畅销”所述惑，不可被“装帧”“鼓噪”所裹挟，要相信自己的眼光与感受，相信时光才是检验图书成色的可靠标准（《好书付与时光流》）。而在后一维度上，作家除了郑重指出“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”，以此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意义之外，同时还在赏读惠特曼、雅姆、帕慕克、波兹曼、以及萧红、易中天等人的作品时，努力发掘并张扬其中的经典元素，诠释经典之所以是经典。这里，值得人们留心一读的还有《为什么不读经典》一文。该篇从当下存在的疏离经典的现象入手，一边检视走近经典的“屏障”，一边盘点生成经典的条件；一边分析经典难读的原因，一边阐述经典必读的理由，堪称对经典问题别有深度的探索，颇具拓展性和启示性。

对于严肃认真的读书人而言，确立为什么读和读什么的正确认识固然至关重要，而掌握怎样读的有效方法同样必不可少。在这方面，彭程无意编织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，但透过其紧贴心灵的娓娓道来，我们仍可窥见内中包含的悠长自在的读书门径。首先，彭程读书很少作单纯的观念演绎或兴趣挥洒，而是习惯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，将阅读内容与相关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，展开剖解或对话。譬如：《在童年消逝的背后》指出取消了差异的电子信息环境所导致的儿童心理特征的退化；《精神的高地》则由高校新生入学说起，把强化大学教育人文内核，进而高扬大学精神的严肃话题，重新摆在了读者面前。诸如此类的言说，使《足印》呈现出清醒的“问题意识”与深沉的人文关怀。其次，彭程读书从不满足于单向度的、被动的了解和接受，而是善于在阅读过程中调动自主性知识储备，进行能动性内容开发。于是人们看到：纪实作品《欧亚远征》背负了人类的潜能与梦想；《死亡的脸》讲述病房里的故事，折射出生命的尊严与人性的暖意；而小说《冷山》的“七年之旅”，则再次证明即使在信息时代，成功的文学写作仍然需要精雕细刻、锲而不舍的精神……凡此种种，使诸多作品及其阅读过程变得充实和丰富起来。

“鸳鸯绣出从教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。”那是古人的说法。彭程恰恰相反，他在书海的寻幽探奥，正可作金针度人。

白瓷时代的“一带一路”

——读《白瓷之路：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》

文/禾刀

在西方接触中国瓷器方面，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不能不提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威尼斯人马可·波罗17年的中国游历。1291年，马可·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，自此欧洲人才有幸接触瓷器。8年后，他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进一步描述了在福建德化窑的制瓷见闻，“刺桐城(泉州)附近有一别城，名称迪云州(德化)，制造碗及瓷器，既多且美”。“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正是因为马可·波罗，才掀起欧洲人对瓷器的狂热，也揭开了欧洲人四百年摸索瓷器制作工艺的漫长历史。

另一起当然要数“克拉克瓷”。1602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葡萄牙商船“克拉克号”，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。当东印度公司把这些瓷器运到欧洲拍卖后很快引起轰动，这批瓷器因查无产地，故被命名为“克拉克瓷”。

通过陆路抵达元朝的马可·波罗，穿行的正是后人所称的丝绸之路。而装载大量瓷器的克拉克号更可能走的海路。某种意义上，中国瓷传入欧洲路线与今天的“一带一路”走向不谋而合。

作为白瓷的忠实拥趸，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·德瓦尔历时18个月，先后走访了中国景德镇、德国德累斯顿、英国普利茅斯三大世界著名瓷都，在本书中以贯穿中西的视角，结合了旅游札记、回忆录与历史讲述，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，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。

中国瓷在欧洲曾被称为“白金”，虽然欧洲人梦想像中国人那样制瓷，但直到1708年1月15日，长期被奥格斯都关在城堡地下室里的德国炼金师弗里德里希·波特格尔特才研制出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白色硬质瓷。资料表明，马可·波罗关于瓷器制作的文字令波特格尔特获益匪浅。另一位为欧洲制瓷做出“卓越贡献”的当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。

1712年，在景德镇“潜伏”7年之久的殷弘绪向欧洲耶稣会奥日神父寄了第一封万言书。他这当然不是汇报“本职”工作，而是详细披露了制瓷工艺。1716年，《科学》杂志原文发表这封万言信，中国制瓷界坚守了千多年的秘密，就这样被欧洲人一文不值地公之于天下。还是这位挂羊头卖狗肉的殷弘绪，发现自己的第一封信对欧洲制瓷没有太大帮助后，10年后再接再厉又发回一封万言信，这次他谈得更细更深更全，简直就是一本制瓷百科全书。
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在超级间谍殷弘绪矢志不渝的努力下，中国瓷在欧洲终于生出了孪生兄弟，并迈向蓬勃发展之路。1793年，当英国大臣马夏尔率领庞大代表团来华时，居然把韦奇伍德瓷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。坐井观天的乾隆对此自然不屑一顾，被其一同锁入库房的还有上千件打着工业革命烙印的最新成果。



不无讽刺的意味是，在写到殷弘绪时，德瓦尔极尽溢美之词。殷弘绪偷走了中国制瓷工艺，德瓦尔却以“这位勤学好问的神父”称赞，并狡辩“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，但真正的主题是同情”。在殷弘绪一再向欧洲详尽披露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内幕时，欧洲知识产权保护已渐成气候：英国在1623年颁布了《垄断权条例》，1709年制定了《安娜女王法令》；法国也于1857年颁布实施了《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》。波特格尔特瓷诞生后，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知识产权保护。

无独有偶，除了白瓷制作工艺被盗外，曾为西方人倾倒的中国茶叶，也因一个叫罗伯特·福钧的英国人盗走了树种和制作工艺而一落千丈。在极度看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，每每提及盗取中国瓷和制茶等技术时，流露的居然是一种恩赐之情，而非对历史的愧疚。

单从中国瓷流入欧洲来看，模仿与山寨并非中国人的特产。德瓦尔也承认，“早期的欧洲自制瓷器深深打上了‘东风西渐’的烙印”。就此，英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的休·昂纳在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中则指出“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，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，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”。休·昂纳认为17世纪始欧洲刮起的“中国风”，本质上缘于一种想当然的夸大想象。

受制于交通阻隔，当年中欧间不可能真正做到时通有无，夸大想象并不奇怪。极为郁闷的当是，白瓷时代的“一带一路”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繁荣，反倒成为西方列强后来侵略中国的重要通道。古今对照不难发现，今天的“一带一路”之所以一经推出便拥护者云集，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四个字，即“互利共赢”。

Advertisement for '综合信息' (General Information) featuring '转让' (Transfer) and '海南温泉现房' (Hainan Hot Spring Ready-to-move-in). It includes contact numbers like 0311-67562315 and 67562307, and a '声明' (Statement) section regarding a lost crane certificate.